



(Bowling for Columbine) 《科倫拜校園事件》 的省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楊洲松

1999年4月20日，就在美國開始大規模轟炸科索沃的一個小時後，兩名原本應該去上保齡球課的青少年學生艾瑞克·哈里斯（Eric Harris）和迪倫·克萊伯德（Dylan Klebold）帶著大量的槍械和爆炸物回到了他們所就讀的位於科羅拉多州傑佛遜郡里多頓鎮的科倫拜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展開一場長達一個小時的血腥大屠殺。在槍殺了12名學生和1名教師，並造成其他24人輕重傷後，兩人飲彈自殺身亡。這起校園槍擊事件震驚了全美國，被視為是歷史上最血腥的校園槍擊事件之一，「科倫拜」（Columbine）一詞也成為校園槍擊事件的代名詞。2001年5月美國科羅拉多州政府在長達兩年的調查之後提出報告指出，這些問題的引發來自於崇尚暴力的大眾文化，包括了教唆年輕人以暴力和屠殺解決爭端的電子遊戲。2004年聯邦調查局的總結報告則指出，犯案的兩人有壓抑和精神病的現象。整體而言，槍擊事件導致了美國社會的道德恐慌，引起人們對於青少年精神狀態與藥物使用、重金屬搖滾音樂、暴力電視電影和暴力電子遊戲的關注。

鬼才導演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就以此事件為基本，以其獨特的黑色幽默，用顛覆傳統紀錄片的紀錄方式完成了《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一片，更廣泛且深入地探討了美國文化中隱藏的暴力問題與媒體問題。因此，本片與Discovery曾嘗試去還原此事件的紀錄片並不相同。導演其實僅是以此事件為導引，而延伸出去探討許多深藏於美國光鮮亮麗社會表面之下的黑暗面。本片一出即技驚四



座，各種國際大獎獲獎不斷，普遍抱持反美霸權情緒的歐洲各影展當然不吝給予獎勵；更猛的是，本片勇奪了2002年的奧斯卡紀錄片獎。尤其是麥可在奧斯卡頒獎典禮領獎致詞時直接向美國總統布希噙聲，更是將本片的聲勢推到最高峰。

本片雖然獲獎無數，卻也爭議不斷，從本片體例究竟算不算紀錄片、導演在紀錄片中的角色究竟為何、影片觀點是否偏頗等，都引起許多的討論。本文並不算深究這些屬於電影專業的爭議性問題，而是從教育的角度，去省思本部影片內所探討的青少年問題與媒體問題。

劇情簡介

影片一開始，導演麥可摩爾就帶領著觀眾到他的家鄉密西根州去做巡禮。先是到了一家銀行，只要在這家銀行開戶便可獲贈一把槍，型號規格任選。原來銀行同時也是槍枝經銷商，因此用這種方式來拉客戶。接著他去理頭髮，理髮店則有兼賣子彈。一開始，麥可便以生活中隨處可得的例子告訴我們：在美國取得槍枝與子彈是多麼的容易啊！而為何這麼容易就可以取得軍火呢？麥可訪問了密西根國民兵，他們說：「武裝是美國人的傳統與責任」、「自我防衛是責任」，因此美國人從小就擁槍自重，而這也是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基本保

障。而國民兵們練靶的目標是一個一個的保齡球瓶，麥可問他們：為何要用保齡球瓶呢？國民兵們說：因為保齡球瓶跟人形最為相似，最適合練靶。導演於此逐漸帶到本片片名的意義“Bowling for Columbine”，意即原本要去打保齡球的兩個高中生，卻攜帶大批槍械回學校將老師與同學當保齡球瓶打。

麥可接下來開始去追蹤這個事件。事件發生的科倫拜中學位在科羅拉多州傑佛遜郡的一個小鎮里多頓(Littleton)。在這個小鎮附近有全球最大的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這家公司同時也是里多



頓最大的雇主，多數居民在此上班。除此之外，北美防空司令部、空軍學院、銻武器研發單位等都位居附近。麥克在此要質疑的是：大人的武器跟小孩的暴力有何差別？幾乎就在美國以洛克希德馬丁生產的武器狂轟爛炸科索沃的同時，附近的兩個高中生也拿著槍對準他們的老師與同學的身體。結果，全美國甚至全世界對科倫拜事件感到震驚，卻似乎對科索沃的死傷平民視若無睹。若我們強力指責青少年的暴力行為，難道可以原諒成人世界的暴力？而青少年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方式會不會也是從大人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方式習得的呢？

麥可接下來就以許多黑白紀錄片回顧了二十世紀美國對外關係的歷史。從二戰之後，美國就儼然以世界霸主自居，不斷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暗殺不乖的政敵、資助親美政權打擊對手、出兵中東與中南美洲等。透過這些軍事暴力手段，一次又一次不斷強化與鞏固美國在世界上的超強地位，但這卻是以無數他國百姓的生命所換取得來。影片配著Louis Armstrong的爵士名曲Wonderful

World，充滿著非常強烈的反諷意味，所謂的美好的世界，其實是美國的美好世界，未必是「他者」的美好世界。而更諷刺的是，就在事件發生後十天，全美步槍協會竟然選在科羅拉多州首府丹佛市舉辦「挺槍大會」，由曾是奧斯卡影帝（1959, 賓漢Ben-Hur）的會長卻爾登希斯頓（Charlton Heston）主持，大倡擁槍自重是美國的光榮傳統，令剛飽嚙驚嚇與痛苦的里多頓居民情何以堪。

而在科倫拜事件發生後，媒體開始大量「製造」各種新聞，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上現場大發議論。歸納眾家學者專家意見，該事件的發生原因有：暴力的電視、電影、電玩與重金屬搖滾等。許多人主張犯案的兩人是受到這些充斥著暴力的多媒體影響，導致他們現實與虛擬不分。歸結到最後，所有矛頭都指向了一個代罪羔羊：重金屬搖滾歌手瑪麗蓮曼森（Mariyan Maison）。但麥可對這樣的媒體操作與結論不甚贊同，因此直接找曼森訪問。曼森表示他對媒體嘗試連結屠殺與娛樂產業之間的關係感到憂心。他很無奈地說，如何能說是受到



他音樂的影響？為何不說是受到美國總統海外開戰的影響？也沒人去怪罪那些打保齡球的人？麥可從這裡開始，一一用「反證法」去推翻前述的各種歸因說詞。若說是受到德國歌德搖滾、法國暴力電影與日本暴力電玩的影響，那這些國家應該更暴力囉？結果並沒有，日本還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呢！若說是源自於民族傳統，德國與日本均於二戰時造成數百萬人死傷，但現在並沒有成為暴力國家。逐漸地，麥可歸納出美國槍擊暴力事件嚴重的原因：因為「恐懼」(fear)以及大發恐懼文化財的政客、軍火企業與媒體。從美國歷史看來，清教徒怕被清算，所以逃離歐洲到了美洲大陸；剛登陸碰上印地安人，因為恐懼，還搞不清楚對方來意就開始濫殺；南北戰爭(Civil war)則是因為害怕黑人造反砍白人老爺的頭；二十世紀以來，懼怕其他國家影響美國利益，因此要不斷發兵海外……。在這種恐懼文化下，政客卻結合企業利用媒體選擇性報導的推波助瀾，不斷妖魔化非白人之「他者」(the other)的偏頗刻板印

象。因為媒體嗜血，和解、差異、尊重沒有收視率，犯罪、暴力才能衝高收視，因此跟政客與軍火企業達成共謀。專家就指出，明明犯罪率下降了，媒體卻渲染少數個案，經由SNG即時連線、24小時滾動式報導與談話性節目等，製造了犯罪率高漲的負面資訊而形成了「道德恐慌」(moral panic)，使美國看來像是個恐懼之邦。老百姓因為恐慌，因此要自衛，自衛不能赤手空拳，因此必須購買槍械防身，無論個人或國家，軍火供應商因此大發利市。麥可舉加拿大作為對比，加拿大1000萬戶中有700萬支槍，犯罪率卻遠低於美國，加拿大人甚至到了夜不閉戶的地步。麥可去檢視他們的電視節目，發現很少有煽情、灑狗血以衝收視的新聞；加上加拿大的政客普遍認為，不應打擊對手而是以政見為競選手段的認知，大大降低了加拿大人敵對暴戾的氣氛。

除了媒體之外，麥可接著討論另一個槍擊案例，直指制度殺人。一個六歲的小孩帶槍到學校將同是六歲大的同班小女孩打死。媒體都報導小男孩的家長



嚴重失職，因為槍枝放於小孩容易取得的地方。麥可卻指出，這有其背後更大的社會經濟因素與制度設計的問題。原來這位小男生的單親媽媽，無力繳交房租而暫住其親戚家，她因為社會福利制度，必須採「以工代賑」的方式到外地工作來領取保險金，每天須要花三個小

時車程去上工，往往是天未亮就出門，天全黑才回家。如此一來原本是社會福利的良善美意，卻使得父母必須離開小孩身邊無法盡責，導致了悲劇的發生。而這制度又是因為州政府將其民營化給私人企業辦理，才使當事人必須離家那麼遠去工作，政府與企業都難辭其咎。

關注青少年問題與關懷問題青少年

從這部影片中，我們其實可以反省的是，青少年問題或是教育問題的成因是有跡可尋的，有賴成人仔細去關注；而問題青少年更有賴於成人給予的關懷。以犯案的兩人而言，他們在學校中的學習經驗似乎是失敗的，而在學校外的社會經驗也不甚愉快。1996年，事件發生以前，兩人曾在網上建立一個網誌，除了放置暴力電玩的過關檔案外，還有一些教導如何惡作劇的指示、爆裂物製作的教學以及一些殺人的計畫，已經顯露出兩人對於社會的不滿，但家長與老師並未察覺他們的心態。直到1997年兩人由於恐嚇另一名同學，被該名同學之父母檢舉，該網站才曝光受到調查。但調查單位顯然並沒有特別重視，

僅將其當做是年輕人彼此間的噓聲，忽略了其中所蘊含的警訊而草草結案，錯失了輔導兩位問題青少年的先機。

另外，有些主張認為，犯案的兩人由於在學校被其他的同學所孤立，導致兩人充滿無助感、不安全感和沮喪感，促使他們打算大幹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以引人注目來進行報復。即如聯邦調查局在2004年的報告中所指出的，犯案的兩人有壓抑和精神病的現象，有無可救藥的自傲心態，急切地想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偉大。因此，事件之後，許多學校遂開始正視校園的霸凌（bully）現象，避免再有青少年因此而累積憤怒和怨恨，做出類似科倫拜事件的悲劇。

而從事件的先兆到發生，成人們



影片最後，麥可帶著科倫拜事件中受傷的兩名學生到K-mart討公道，要求他們停售子彈，因為事件中的900多發子彈全來自這家超市。在幾經折騰與折衝之後，終獲其善意回應，也算是意外收穫。至於全美槍枝協會的會長卻爾登希斯頓仍然堅持擁槍自重是憲法賦予

的基本人權，是美國不可剝奪的光榮傳統之一。麥可在直搗他家訪問並咄咄逼人地加以質疑，結果並未獲得善意回應後，將受害的六歲小女生遺照放在其豪宅門口，希望有天卻爾登希斯頓能良知發現。

似乎對於這兩位漸入歧途的青少年關懷不足。根據Nel Noddings關懷倫理學的觀點，關懷關係(caring relation)是人存有的一種方式，身為一個人(human being)，我們同時是關懷者，也是被關懷者。關懷具有「專注」(engrossment)與「動機設身處地」(motivational displacement)的特性。在與他人的「邂逅」(encounter)中，我們會專注於被關懷者的需求，設身處地去瞭解他的動機，進而產生關懷關係。如果說家長與成人們能經常關懷這兩名青少年的生、心理狀態，專注地聆聽：他需要甚麼呢？他有說甚麼嗎？他有抱怨什麼嗎？他有哪些朋友？他與朋友們都在做甚麼？他有接近暴力的機會

嗎？他是否顯得憂鬱或沮喪？或許在溫暖的關懷關係中，可以挽回這十幾條年輕的生命。除此之外，成人可能還必須去檢討與反省的是，自身是否做了不好的示範作用。關懷的首要步驟就是「身教」(modeling)，透過典範形成，風行草偃，移風易俗；唯當成人世界用武器與暴力來解決紛爭、捍衛權益，甚至大發戰爭財時，以他人生命為芻狗時，如何做為青少年學子的模範？怎有立場指正青少年的脫軌行為？「教育之道無他，愛與榜樣而已矣！」成人世界宜深思。



道德恐慌與媒體素養教育

麥可認為，美國之所以槍枝氾濫，暴力問題嚴重，其中重要因素是因為政客、企業與媒體共謀所製造所出來的「道德恐慌」。「道德恐慌」是由於媒體和大眾的反應過份地誇張和扭曲事件、個人或群體，將其視為是對社會價值和利益的威脅。而道德恐慌的主要掌舵手正是媒體。媒體報導會將某些人刻板印象化，指責他們是所謂的「壞人」，並將偏差行為做出放大的作用，形成對於社會價值與道德倫理的威脅氣氛出來，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恐慌。換句話說，道德恐慌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媒體製造」(mediamaking)出來的，其在「再現」(represent)「實在」(reality)的過程中，是一種「錯誤的再現」(misrepresent)；當權者、媒體與專家們才是道德恐慌的始作俑者，他們對於某人、某事或某物的恐慌遠超過了其所可能真正造成的威脅。透過對於規範與道德的加強約束，他們的主要目的乃在於為了捍衛某些統治利益或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以掩蓋社會危機的真正根源。從麥可的觀點看來，道德恐慌正是政客們與其共生之企業的利益搖錢樹所在。因此，將問題歸因到重金屬音

樂、暴力電玩、暴力電影等青少年可能擁有之次文化上，根本就是轉移焦點、文過飾非。

面對前述這樣的情形，教育上可以做的，是實施媒體素養教育(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協助學生去批判性地判斷媒體所提供出來的資訊，戳破媒體製造的錯誤意識。媒體素養教育就在於教導學生閱讀、分析並解碼媒體文本；教導學生不但要能批判媒體的再現論述，且還要學習運用媒體作為自我表達與社會實踐的行動工具。同時，具批判性的媒體素養不僅教導學生從媒體中學習，也關心發展能賦權學生的媒體技術並使其更主動及有能力參與學習生活及社會實踐。媒體素養教育因而是個教導批判性技能與運用媒體為工具以改變社會現況及提昇自我的綜合取向。而在今日充斥著各式各樣意識型態操弄媒體的臺灣社會中，媒體素養教育更顯見其重要性與價值。



結語

我們慶幸臺灣是個槍枝管制的法治國家，應該不至於發生類似科倫拜校園的嚴重槍擊事件。但是不可忽略的是，臺灣的中小學校園中依然有霸凌現象的存在，其中被霸凌者長期壓抑的心靈若未獲得關注、支援與協助，難保不會有爆發的一天。同樣的，霸凌者的心態與行為亦必須受到關注，不可任由其行為持續下去。無論霸凌者或被霸凌者，都需要成人給予溫暖的關懷，協助他們走出生命的幽谷。而在這個過程中，家長、教育者及其他成人們對於青少年必須多加關注，不僅要關注他們在學校中

的學習生活，也要關注其在校外的生活情形，才能較為全面地瞭解青少年的問題。而除了關注之外，關懷問題青少年，讓他的心靈仍有所依靠，能感受到有人關愛，便不至於憤世嫉俗、偏差激進，方能有效地消弭青少年問題。另外，媒體製造的道德恐慌亦需受到批判性的解讀。電視、電影、電玩、搖滾樂與暴力行為間的關連性並未獲得高相關的證實，要完全禁制這些多媒體不可行也沒必要；較為積極而正向的方式還是透過媒體素養教育的實施，協助青少年增進其批判性的判斷能力。

註一、本文有關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始末之陳述，主要參考《維基百科》，2007/2/27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

註二、本文有關道德恐慌與媒體素養教育之論述，主要參考楊洲松（2004），《當代文化與教育—文化研究學派與批判教學論的取向》一書。